

古史新话 拜占庭研究的亮点

快速发展的拜占庭学进入全面反思的特殊时期。全球拜占庭历史与文化研究工作者接受新理论，发现新史料，采用新方法，拓展新视野，力求在拜占庭学各个领域审视以往的研究结论，提出新见解。本书就是在这一大背景下进行的学术尝试，带着新问题意识，希望为读者提供新成果。

陈志强◎著



古史新话 —— 拜占庭研究的亮点

快速发展的拜占庭学进入全面反思的特殊时期。全球拜占庭历史与文化研究工作者接受新理论，发现新史料，采用新方法，拓展新视野，力求在拜占庭学各个领域审视以往的研究结论，提出新见解。本书就是在这一大背景下进行的学术尝试，带着新问题意识，希望为读者提供新成果。



陈志强◎著

责任编辑:于宏雷

封面设计:肖 辉 汪 阳

责任校对:孙寒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史新话:拜占庭研究的亮点/陈志强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2
ISBN 978-7-01-018407-4

I. ①古… II. ①陈… III. ①拜占庭帝国-历史-研究 IV. ①K1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56797 号

古史新话

GUSHI XINHUA

——拜占庭研究的亮点

陈志强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环球东方(北京)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9 年 2 月第 1 版 2019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8.75

字数:430 千字

ISBN 978-7-01-018407-4 定价:8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牛津拜占庭史》的亮点(代序)

21 世纪初以来的十余年,国际拜占庭学的可持续发展表现得特别明显,尤其是拜占庭史研究的变革非常突出,传统的研究结论正在得到普遍的反思,新的研究理论不断突破以往的研究范式,拓展出新的研究领域。诚如学者们注意到的那样,“重新解释和质疑公认观点之风对拜占庭历史的影响比任何其他时期都要深刻。在许多极为重要的问题上,学术界也不再有一致的看法。”^①《牛津拜占庭史》主编西里尔·曼戈在全书序言中给出的这一准确判断可以用来描述我们所处的 21 世纪初期拜占庭史研究的概况。

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于 2015 年出版的《牛津拜占庭史》是“牛津世界史丛书”(中译本主编郭小凌)中的一本,其史学作品的专业性、图文并茂的可读性、信息周全的教材特点都非常突出,笔者无意在此赘言。这本 21 世纪之初问世的作品汇集了诸多国际拜占庭学界长期争论并逐渐形成共识的“公认识”,它既是对过往一个时期拜占庭学术进展的总结,也是对 21 世纪拜占庭研究动向的预判,因此与“牛津世界史丛书”其他作品一起构成了欧美学界教材的巅峰之作,与剑桥诸史比肩,执发达国家各国教材编纂之牛耳,此间重要意义也非笔者谈论的重点。我们在将该书翻译为中文和而后多次校对过程中几度通读全书,深感曼戈教授的判断值得回味,而书中各章作者提出的真知灼见需要认真“把玩”,其中闪烁的思想火花弥足珍贵,对我国从事拜占庭研究的专业人员有特殊的启发价值。

^① 西里尔·曼戈著,陈志强、武鹏译:《牛津拜占庭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序言。Cyril Mango, *The Oxford History of Byzantiu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一、经济生活方面

拜占庭社会经济研究内容复杂,相对于其他方面这一领域的研究难度更高,因为在重视精神文化生活的拜占庭作家那里,物质生活常被忽视,留下的史料故而稀少。除了众所周知的几位拜占庭学“高手”,如亨迪之于拜占庭货币研究、里梅尔雷之于拜占庭农业研究、卡拉扬诺布鲁斯和奥斯特洛格尔斯基之于拜占庭军区制研究、斯坦因之于拜占庭手工业行会研究等,詹姆斯对6世纪以前晚期罗马帝国经济概况研究、罗斯托夫采夫对罗马帝国经济全面研究中涉及的拜占庭部分、拉伊奥对6世纪以后拜占庭经济的全面研究等^①,都构成了我们对拜占庭经济生活的认识框架和基本知识体系。

《牛津拜占庭史》作为教材,并未深入讨论相关细节,在此方面“建树”虽然不多,却处处闪现出反思的智慧火花。譬如在拜占庭小农经济问题上,该书明确指出:“我们过去被告知说,帝国在9—10世纪的‘健康’发展应该被归因于小自耕农经济的繁荣,在不耕种土地的时候,自耕农组成的农兵们还要担负保家卫国的职责,之后,这一完美的制度被那些贪婪的大地产者们颠覆,导致国家在11世纪人心涣散,走向了全面的衰落。的确,10世纪的皇帝们试图通过立法限制‘权贵们’对农村公社的侵蚀,但是小自耕农经济究竟有多普遍,又是如何在经济上具有重要性的呢?……为何较之先前时代,帝国在11—12世纪的经济活动显著地达到了新的高度,同时拥有了更

^① A. Harvey, *Economic Expansion in the Byzantine Empire 900–12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1990. M. F. Hendy, *Studies in the Byzantine Monetary Economy: c. 300–14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A. H. M. Jones, *Cities of the Eastern Roman Empi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A. Laiou,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Byzantium: From the Seventh through the Fifteenth Century*, 3 vols. Washington, D. C.: Dumbarton Oaks Research Library and Collection 2002. A. Laiou, *Peasant Society in the Late Byzantine Empire: A Social and Demographic Stud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Lemerle,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Byzantium*, Galway: Galway University Press 1979. R. S. Lopes, *The Byzantine Economy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London 1978. G. Ostrogorsky, *Quelques problemes d'histoire de la paysannerie*: Bruxelles: Editions de Byzantion 1956.

多的财富呢?”^①显然,作者的用意是强调小农经济并不像我们先前认为的那样对拜占庭帝国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此处提出的问题是传统认识的一种挑战,或者说,这样提出问题比得出某种结论更有震撼力,更令人深思。事实上,小农经济一直被我们认定为拜占庭皇帝专制王朝统治的基础,其缴纳的税收也一直被认为是支撑拜占庭帝国的财政来源。但作者在此提出的问题明显提示我们要充分认识贵族经济对于拜占庭帝国的重要意义。换言之,传统的认识是否高估了拜占庭小农经济的重要性?

由此牵扯出来的问题涉及对拜占庭军区制改革的研究。该书明确质疑说:“现代学者争论的主要问题在于,这些最初出现的军区是如何建立的?我们掌握的最初确证都来自9、10世纪,这个时期也是我们所有资料最集中的阶段。当时,军区的将士们不是像6世纪及其以前那样主要靠现金军饷,而是靠其军区辖区内划分成特定价值的小块颁授土地,来维系和装备自己。这里的问题是,此时的这些军区是否还多多少少具有7世纪中期首度出现的军区那样的形态,或者它们只是通过某种变革和变化过程才具有这样的形态?”^②如此质疑的理由是,7世纪并没有相关的史料提供军役土地是如何颁授的,而后来的立法文件中提供的证据也不详细,只不过是学者根据9世纪以后皇产土地少了,而军役土地多了这个现象合理想象推测出来的。这与其说是怀疑军区制下农兵这一历史事实,不如说是对拜占庭历史上小农经济作用的反思。如果这一反思成立的话,必然将导致拜占庭社会小农经济没有贵族经济重要的结论,这样的意见太具有颠覆性了!

在解释拜占庭历史曲折发展的原因这样重大问题上,该书并未轻易给出结论,作者也没有沿着提问的方向继续追问下去,反而通过拜占庭军队人数在几个世纪中的变动支持传统认识,即“这个时期社会军事化的现象到处可见。具有各自行政总督的旧省区被军区所取代,军区的‘将军’及其幕僚按照类似于军事法的法律进行管理”。也就是说,拜占庭军区制改革仍

① Cyril Mango, *The Oxford History of Byzantium*, p.9.

② Cyril Mango, *The Oxford History of Byzantium*, pp.132-133.

然可以被认为是决定帝国命运的重大事件,其影响依然十分深远。作者还进一步肯定,“出现的不是一种渐进的社会变革而是突然的管理制度的变革,最有可能的是军役土地颁授取代了大部分军饷。”而7世纪以后货币发行量的减少和中央与地方行政官员的减少也从几个侧面证实了军区制改革带来的影响。^①

该书作者反思的真正意图逐渐呈现出来,他提出要“解开这个谜团的线索在于自659年到668年任‘边境贸易官’的大教长斯蒂芬,这个最活跃的官员留下了10枚铅封,涉及至少3个军区的5个仓库货栈,他还担任‘军需总长’,即朝廷负责供给军队的大臣。这些货栈的主要功能可能就是向将士们出售武器装备,而他们即便假定自己支付开销,也需要有可靠的地方去购买军需装备”。^②也就是说,我们传统研究获得的信息及其得出的结论主要来自零散的文献证据,显然是不充分的,因此需要充分重视包括铅封在内的多种考古文物在军区制改革初期历史研究上的极端重要性。换句话说,有关军区制改革的历史需要新的文献和文物史料基础上重新构建,形成文献与文物双重证据研究基础。

类似的反思也出现在拜占庭商业贸易研究领域。该书充分肯定了拜占庭商人活动的空间范围遍及地中海、黑海、红海、阿拉伯海、北海各地,同时更扩大了拜占庭商人活跃的时间范围,非常肯定地认为,“即便私人的积极主动性受到限制,活跃的地区间贸易可能还是存在,这从用作运输容器的双耳瓶发掘物可以得到证明。它们装入的货物包括蜂蜜到鱼子酱等各种商品,但是更多专用于航运大宗油类和酒类货物。有6种类型的双耳瓶来自于东地中海……早期拜占庭的双耳瓶已经在整个地中海、不列颠、黑海、红海和阿拉伯海沿岸被发现……中期拜占庭继续使用双耳瓶。在地中海以外

① Cyril Mango, *The Oxford History of Byzantium*, p.144. 当时,整个中央朝廷官僚机构似乎已经精简到约600人。各省区除了税收官,包括“边境贸易官”在内,很少见到任何行政官员了。Cyril Mango, *The Oxford History of Byzantium*, p.148. 拜占庭皇帝们总结了大量政变的历史后,设法将一度成功的大军区分划为更小的单位,避免了叛乱的发生,“或者不再像过去那样流行兵变。尽管拜占庭帝国能够预见到未来会有许多麻烦,但是至少到此时,它不再被迫为生存苦苦挣扎。”Cyril Mango, *The Oxford History of Byzantium*, p.142.

② Cyril Mango, *The Oxford History of Byzantium*, p.146.

的君士坦丁堡和黑海地区还发现了一些被确定属于8—10世纪的文物样本。11世纪以后,拜占庭式双耳瓶再度大量出现在黑海和地中海地区。到14世纪,黏土双耳瓶的使用才逐渐减少,而木桶越来越多,很可能是因为意大利人垄断了商业贸易。”^①换言之,科穆宁王朝以后的晚期拜占庭国际贸易不再是传统意见认为的大幅度衰落、其优势地位被意大利商人所取代的状况。至于此后拜占庭帝国“在经济上,通过将海上的国际贸易拱手让给意大利的城市共和国,拜占庭人是自毁前程,还是从中获得了利益呢?”作者再度以提问的方式,促使读者关注传统认识的疑点,其中最大的反思点是11—14世纪的拜占庭对外贸易活动并未萎缩,拜占庭人继续占有海上商业活动的巨大利益。进而我们指责科穆宁王朝皇帝阿莱克修斯一世向意大利商人出让海上贸易特权的传统意见也需要重新思考。^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反思也同样是建立在当代考古学新发现基础上,而不是仅仅依靠文献证据提供的信息。

至于采用生态环境史理论等新研究方法探讨拜占庭经济生活的例子也值得一提。作者从6世纪鼠疫导致的人口减少入手,进而分析了拜占庭城乡经济萎缩和城市生活倒退,认为“人口减少可能是经济萎缩的主要原因,这也影响了这个时期的城镇和乡村。鼠疫瘟疫曾在6世纪袭击过帝国,而后一再爆发。747年到748年的君士坦丁堡瘟疫造成相当多死亡,以至于君士坦丁五世从希腊向这里迁徙并安置居民。帝国内爆发瘟疫的最后一次记载是来自意大利南部,至少晚于767年”。“7世纪期间,拜占庭人放弃古希腊罗马那种宏大城市的风格,那些城市拥有棋格式平面图、宽阔的街道、宽广的广场、宏伟的公共建筑物。这样的城市在人口锐减的时代已经成为一种难以承受的奢华,瘟疫、突然来临的外敌入侵和围困降低了人口。除了像君士坦丁堡和塞萨洛尼基这几个已经修筑起坚固城防要塞的城市之外,居民们节省开支和精力来建造城墙,只把最能够设防的地区围住。他们放弃大部分城市的大部分空间,甚至将一些城市从平原挪到更容易防守的山

① Cyril Mango, *The Oxford History of Byzantium*, pp.163, 165.

② Cyril Mango, *The Oxford History of Byzantium*, p.9.

坡上去。”^①这样的图景确实颠覆了我们过去的看法,以为军区制改革解决了外敌入侵和帝国自身抵抗能力不足的制度性缺陷,进而促使拜占庭经济危机得到缓解,国家实力得到增强。而该书作者提示我们要充分重视多种原因造成的人口减少这一因素。同时,拜占庭社会组织军事化也反映在城乡格局的变化方面。

总之,在拜占庭经济生活研究方面,该书提出了许多新问题,这里仅举几例进行说明。诸如拜占庭货币长期坚挺、保持稳定的国际货币地位是否有利于帝国经济发展?判断拜占庭经济繁荣是不是应该在国库盈余、税收稳定等因素之外,增加生活质量、人们掌握更多财富等因素?这些问题对于仔细揣摩该书细节的读者一定具有启发性。

二、政治生活方面

《牛津拜占庭史》对拜占庭政治生活研究领域的反思也同样丰富多彩,我们长期形成的有关拜占庭政治生活的知识大多受到了质疑,富有启发性。^②

拜占庭皇权继承制度是帝国政治生活的核心内容,从君士坦丁一世开始推行血亲世袭继承制的王朝体制后,这几乎成为此后十几个王朝一直坚

① 陈志强:《地中海首次鼠疫研究》,《历史研究》2008年第1期;陈志强:《“查士丁尼瘟疫”影响初探》,《世界历史》2008年第2期。Cyril Mango, *The Oxford History of Byzantium*, pp. 149, 148.

② 拜占庭政治研究特别是官制研究一直是个难点,我们对此的了解多从下列这些主要参考书籍中获得。A.E.R.Boak, J.E.Dunlop, *Two Studies in Later Roman and Byzantine Administration*, New York, London: Macmillan 1924. J.B.Bury, *The Imperial Administrative System in the Nine Century*, London: Pub. For the British academy by H. Frowd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11. F. Dolger, *Das Kaiserjahr der Byzantiner*, Munich: Verlag der Bayer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49. J.F.Haldon, *Byzantine Praetorians. An 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al and social survey of the Opsikion and Tagmata*, Bonn: R.Habelt 1984. I.J.Maksimovic, *The Byzantine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 Amsterdam: A.M.Hakkert 1988. S.Vryonis, *Byzantine Imperial Authority*, Paris 1982. 如果读者细心阅读,则他们的观点大多受到挑战。

持的制度。然而,传统的研究更多关注的是具体王朝或者某位皇帝的继承问题,形成的基本共识也主张自君士坦丁大帝以后这一制度得到了有效的落实,并形成了与欧洲其他古代国家不同的特点,同时也忽视了这一制度发展的过程和演变的阶段性特征。^①该书注意到了这样的缺陷,它在肯定了拜占庭帝国“最终突显出来的是王朝世袭原则的强大力量,它使马其顿王朝能够在所有这些兴衰变迁中幸存下来,它也阻止了篡位者们杀害继承皇位的幼子和女性继承人的企图”的同时,特别强调了这一制度在科穆宁王朝时期达到全盛。“阿莱克修斯一世开始的王朝男性血统世袭继承制延续了一个多世纪。科穆宁家族还是拜占庭历代帝王中延续最持久的皇族,因为从1118年到1461年相继为帝的所有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和拜占庭皇位继承者几乎没有例外地都来自阿莱克修斯,并且使用科穆宁的名号……拜占庭帝国最后几个世纪出现的这种异乎寻常的变化,原因……在于他把皇室建设纳入帝国中央朝廷制度框架的系统政策。”特别难得的是,该书并非简单认定科穆宁王朝是拜占庭皇权继承制度发展的顶峰,而是深入解析了变革的结构性内容,认为“其王朝世袭继承的基础是王朝的统治,其中皇帝的身份并不仅仅是垂直地代代相传,而且还横向扩展到他的整个亲族和相互联姻的各个家族,首先和最重要的是阿莱克修斯自己的妻子伊琳尼所属的杜卡斯家族。马其顿王朝未能寻求与其他家族建立联姻关系,或至少没有区分各家族的等级次序,但是阿莱克修斯一世却精心经营着这些关系。结果,一代人以后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新贵族,他们拥有大量财富,生活方式典雅尊贵,占据军界要职,均为皇帝的亲戚,具有‘贵族’以上高等级头衔,这个希腊语头衔相当于‘奥古斯都’”。^②这也许是我们通常肯定阿莱克修斯一世帝国政治治理的成果,也是拜占庭帝国“中兴”的重要方面。^③作者在对比马其顿和科穆宁两个王朝政治治理策略中提出的见解值得重视。

① 陈志强:《拜占庭皇帝继承制度特点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拜占庭皇帝谱牒简表》,《南开大学历史系建系75周年周年纪念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② Cyril Mango, *The Oxford History of Byzantium*, pp.203-205.

③ 陈志强、李秀玲:《皇帝阿莱克修斯的帝国政治治理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

但是,作者在涉及这一“成果”的影响时,却给出了负面的评价,“然而,越来越多的挑战却来自日益膨胀的皇家内部,最终当曼努埃尔一世(1143—1180年在位)去世并留下个11岁大的儿子阿莱克修斯时,这种挑战便具有破坏性。曼努埃尔的堂兄安德罗尼库斯一世(1183—1185年在位)废黜并杀害了阿莱克修斯二世(1180—1183年在位),这使得他本人或者在他以后轮番夺取皇权的皇帝都不可能确保王室贵族的忠诚……也就不能阻止第四次十字军占领君士坦丁堡了。”^①也就是说,当拜占庭皇位继承制在断绝了皇族血亲之外觊觎者梦想的同时,并没有根除拜占庭皇权专制的根本矛盾:即过度集中的公权力与利益集团分权倾向间的冲突,只不过是这种深层次矛盾转移到了皇族内部,引发了此后愈演愈烈的皇族内部血腥厮杀的历史现象。这一深度反思发人深省。

我们通常从外部观察拜占庭帝国政治生活时,认为其政治结构稳定,官僚体系庞大,专制权力集中,存在的时间长远,在欧洲地中海世界无出其右者。但《牛津拜占庭史》并不这样认为,其观点非常明确,“拜占庭帝国并没有发达的政治理念也没有现代专制国家残暴的国家机器,它只在有限的范围内推行国营经济。但是,没有任何人力或物质资源不是在国家宣称的控制和剥削范围之内,也几乎没有什么经济或社会制度不是来源于政府出于政治目的进行的资源调配。”“人们对这些更宽泛的一般情况作出合理肯定的同时,对这个时期拜占庭历史更详细的细节描述就比较困难了,多多少少存在争议。我们拥有的成文史料并不令人满意,因为它们提供不了多少拜占庭帝国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的描述。考古学家们提供的有关拜占庭文物的报告支离破碎,形成的意见和通常人们具有的模糊不清的看法也差不多。有些历史学家认为拜占庭帝国在7世纪期间就是个组织良好的国家,与早期的罗马帝国没有根本区别,而其他历史学家则坚持说拜占庭帝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是一个没有组织的社会,更像是早期中世纪的西欧。”^②“更像”西欧中古社会?这个说法彻底颠覆了我们传统的认知,也促使我们重

① Cyril Mango, *The Oxford History of Byzantium*, pp.205-206.

② Cyril Mango, *The Oxford History of Byzantium*, pp.198, 142.

新审视欧洲东、西部的社会政治生活,在强调两者间的差异的同时,还要注意它们的共同性。而做好这类宏观对比思考的基础则是进一步厘清拜占庭帝国国家制度。

《牛津拜占庭史》认为,不仅中央权力结构不成体系,而且地方权力发展也不够成熟,“在这些大贵族中的福卡斯和斯科莱鲁斯两大家族于976年到989年几乎就要夺取皇帝瓦西里二世的皇位后,瓦西里便千方百计设法削弱贵族和土地之间的联系,没收他们的产业,取消他们通过购买和馈赠得到土地的机会,让他们接受短期的军事调令离开各自的地方……11、12世纪的拜占庭上流社会整体上明显缺乏地方主义和地方观念。这可能造成了拜占庭小亚细亚地区的瓦解;很明显,这也对帝国能在如此众多高级官员失去领地后仍然长期存在发生了影响。”^①换言之,传统上一直认为地方分裂势力对中央集权侵蚀是有害帝国中央集权政治的观点存在缺陷,至少足够强大的地方势力对于拜占庭帝国整体实力的强盛并不都是负面因素。这与我们传统的认识确实非常不同。

在该书作者看来,“拜占庭君主政治的原理中包含着一些自相矛盾之处,这些问题还没有被足够地讨论过。首先,皇帝在理论上应该是全体人民、至少是全体基督徒的统治者。这很明显与事实不符……其次,如果说皇帝是由上帝选择的话,那么为什么偶尔会出现邪恶的皇帝(如福卡斯等)、异教徒皇帝(如朱利安等)、信仰异端的皇帝(如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和瓦伦斯等),抑或在奥斯曼苏丹统治时期出现青睐穆斯林的皇帝呢?一个简单的答案是:为了惩罚基督徒犯下的罪恶。那么要服从这样皇帝的统治吗?答案是肯定的。”^②人们不由得产生这样的问题,是皇帝决定帝国还是帝国决定皇帝?拜占庭君主政治的矛盾核心问题是什么?这些都需要深入思考和研究。换句话说,我们至今对拜占庭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还非常欠缺,还需要借鉴我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优质资源进行深入探讨。

那么,拜占庭政治上的不成熟源于何处呢?该书认为来自于罗马时代

① Cyril Mango, *The Oxford History of Byzantium*, pp.199–201.

② Cyril Mango, *The Oxford History of Byzantium*, p.14.

的遗产,因为古代罗马帝国“地方社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因此国家的最高机构实质上旨在维护一种植根于意大利地区并以罗马为中心的、服从于元老院且相当保守的秩序”。“罗马世界的军事安全……岌岌可危。而那些蛮族部落自身在来自欧亚大草原的任何威胁面前也十分脆弱……欧亚大草原的不稳定会导致那些具有高度机动能力的游牧部落向西迁徙……在北方给罗马帝国造成极大的混乱。”这种不稳定性到了拜占庭时代便逐渐消失了,因为拜占庭国家的行政网络彻底固定了人口流动的机动性。换言之,拜占庭人从罗马帝国继承的并非完善的国家体制和理念原则。该书甚至认为,“在这些基本原则方面,拜占庭帝国与西方基督教世界完全一样。的确,它正是从西方学会帝王们尊崇教士权威的榜样……拜占庭帝国以不同于西方的方式……皇帝参与统治圣徒国度。”长久以来,我们一直认为,拜占庭皇权专制及其相关礼仪,特别是皇权神授的观念来自于包括波斯在内的东方。该书作者提出此类影响来自西欧的看法确实颠覆了传统的观念,不仅不是拜占庭帝国为欧洲皇权增加了信仰的色彩,而是相反,拜占庭人从西欧人那里学会了教权高于皇权。直到6世纪,“皇帝才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查士丁尼比他之前的历代皇帝更为明确地宣称,皇帝和教士的权威都来自于同一个神圣的源泉,因此皇帝有责任独自控制教士和基督教会活动。皇帝的典礼仪式也逐渐变得更具宗教气息,强调皇帝处在神权与世俗权力交汇点独一无二的位置。”^①

拜占庭帝国政治生活研究一直是学界的重点,因此从启蒙时代直到21世纪之初,人们已经形成了大体类似的看法,即便在个别问题上存在争论,总的结论类似,并形成了固定的思维。《牛津拜占庭史》提出的新问题几乎在所有知识点上都形成挑战,对我们不再存疑的结论都进行了彻底的反思,或者在观察的角度上,或者在思维的理论,或者在史料的考证上,或者在史实的重构上,或者在文字的表述上都提出疑问。这样的教材对初学者十分有益,同时对研究者也具有启发性。

^① Cyril Mango, *The Oxford History of Byzantium*, pp.22, 36, 207, 45.

三、宗教生活方面

拜占庭宗教生活也是《牛津拜占庭史》反思的重中之重。^① 在涉及拜占庭宗教思想、教会组织、制度礼仪、神学信条、发展结点等重大问题上,该书均进行了实实在在的反思,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问题。这里仅举几例加以展示。

基督教产生于公元1世纪的巴勒斯坦地区,并在东地中海沿岸各地逐渐传播,最终使整个欧洲地中海都接受了这种信仰。4世纪君士坦丁大帝统治时期,它实质上成为帝国的“国教”,“传统的多神教甚至在晚期罗马帝国崩溃之前就从东部帝国消失了。我们已经大胆推测,在君士坦丁时代,基督徒大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0%。到4世纪末期,他们的数量增长到50%,而到5世纪晚期则达到90%。查士丁尼毫不留情地抹去了多神教徒的最后一丝残迹。”^②基督教在这数百年的时间里发生了什么变化?君士坦丁大帝这位被封圣为“第13使徒”的君主采取的基督教政策在其中是否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崇拜一神上帝的基督教是如何与信奉多神的古典文化相结合并演变为拜占庭帝国(乃至整个欧洲)信仰的核心和最鲜明的标志?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在该书的多种叙述中被提了出来,其解答的方式也与众不同。

该书首先注意到基督教兴起的最初几百年里那些复杂的背景,其丰富多彩达到了令人目不暇接的程度。譬如按照罗马人的看法,基督教是不是

① 拜占庭宗教生活研究也是学界的关注重点,出现了大量成果,如 M. Angold, *Church and Society in Byzantium Under Comneni, 1081-126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R. Brown, *Society and the Holy in Late Antiqu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 C. N. Cochrane, *Christianity and Classical Culture: a study of thought and action from Augustus to Augustin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 Galaxy Book 1957; F. Dvornik, *Early Christian and Byzantine Political Philosophy*, 2 vols, Washington D. C.: Dumbarton Oaks Center for Byzantine Studies 1966; J. M. Hussey, *The Orthodox Church in the Byzantine Empir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6; R. MacMullen, *Christianizing the Roman Empire*, New Haven 1984。

② Cyril Mango, *The Oxford History of Byzantium*, p. 111.

宗教还无定论,“基督教是一种宗教、迷信还是哲学呢?按照罗马的标准来说它很难被归为一种宗教。”其次,基督教自身的思想和组织发展也达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程度,在数百年的神学、哲学、教义争议中,基督教最初的简单信条变化出许许多多教派,它们以正统和异端的形式活跃在各个地区。该书把这个过程看作是基督教自身完善的过程,“因为就在那个时候,基督教思想家们已经着手启动不可逆转的进程……也就是说一种协调一致的完整体系,这一进程被评价为古代晚期知识领域最重要的成就。”再者,作为国家权力最高代表的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在这个过程中的特殊作用,也不像我们通常解释的那样“高、大、上”,对基督教的青睐不过是他个人的选择,迁都“新罗马”只是庆贺战胜了最后的对手李锡尼,“为了褒奖这场胜利,君士坦丁命令将位于尼科米底亚邻近地区,也就是博斯普鲁斯海峡欧洲一侧的希腊古城拜占庭重新敬献给自己,并将其命名为君士坦丁堡。”^①正是在这个新都城及其周围的东罗马世界,君士坦丁皇帝强制地把基督教与古典文明结合起来。一切都好像重新还原到了具体的实际生活中。

《牛津拜占庭史》提示我们要重新思考如下几个问题。

一是基督教与罗马的宗教不同之处在于,“罗马的宗教是公共性而非个体性的宗教,这就意味着它由国家操控运转。这种宗教没有神圣的经典,没有职业的教士,也没有教义……古罗马的宗教并不考虑‘大问题’,如宇宙的起源、生命的意义,或是终极的末日等等。”因此,罗马人认为基督教“不是那种罗马式的公共宗教,而看上去像是国际性的地下犯罪组织。它没有那些罗马人习惯的崇拜活动,如向神像献祭牺牲。当然它也有自己的仪式,但是这些仪式是关起门来进行的”。^②基督教的私人信仰形式让罗马人很不适应,而基督思想家们谈论的高深问题也让罗马人感到玄妙,至少认为是些“杞人忧天”的奇怪想法。事实上,基督教从犹太教的一个弱小派别萌发出来,与时俱进地与罗马世界复杂的“国情”相适应,不断调整、修改、完善自身的信仰体系。在这个基督教早期发展进程中,基督教教父们长期

① Cyril Mango, *The Oxford History of Byzantium*, pp.97, 99, 21.

② Cyril Mango, *The Oxford History of Byzantium*, pp.96-97.

探讨、争辩、论战的问题都关系着基督教神学体系的建立,他们在有意无意地建构着基督教的独立信仰,这一信仰既要摆脱犹太教的“母体”,又要脱离古典哲学的“父体”,成为具有独立地位的新宗教。其核心信仰的“三位一体”是天国和现世的结合,其具体形象是“在天为父、在地为子”的耶稣基督,他既是有形可见的,又是无形神秘的。

二是基督教萌发阶段与基督教后期发展不同,换言之,它并非从始至终一成不变。“从君士坦丁打开其身上枷锁时起,一直到拜占庭历史结束为止,基督教的教义绝非一直没有变化。”“尤其是关于圣子的阐述,在君士坦丁之后还要延续整整3个世纪。然而,如果我们回到更早的时代,就会发现并非所有的基督徒都热衷于将基督教转化为一门哲学,他们牢记圣保罗的警示:‘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就把你们掳去’。(《歌罗西书》,2:8)在这一问题上,基督教徒内部有广泛的歧见,一些人,如殉教者查士丁认为,基督教是唯一‘确定和有益的’哲学派别。而德尔图良则有一句名言,认为雅典和耶路撒冷毫无关系。(‘所以雅典和耶路撒冷有什么关系呢?学术对教会有什么益处呢?……我们的教规是来自于所罗门的柱廊。’)基督徒不是哲学家不仅仅是因为哲学的虚空性,它不为我们提供固定的答案,而更重要的是哲学没有效用,它不能驱走恶魔,而基督教可以。”^①也就是说,基督教经历了几百年的思想争论和试验,在其最初“百家争鸣”的神学思辨和组织建构时期,既保留了许多理论和实践成果,也淘汰了大量“错误的”和不合时宜的结论。因此,后人在描述这个时期的基督教时也不能简单化。

三是基督教初期许多教派及其殉教者寻求的目的存在很大差异。该书明确认为,基督教初期存在的多种异端是一种思想上的斗争,“阿里乌派学说……在许多方面都被聂斯脱里派所承袭……此后就是基督一性论……基督一志论是基督一性论苍白无力的后续理论,它的提出是出于政治考量,在680年的基督教大公会议上遭到彻底埋葬。这是最后一次‘壮观的’异端运动。”“我们至今依然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答案,为什么数以千计的人宁愿

^① Cyril Mango, *The Oxford History of Byzantium*, pp.99-100.

承受迫害甚至死亡,也要就基督是在两性之中(en)还是由两性而来(ek)的问题争论不休,他们都坚信自己的论敌犯了弥天大错,分割或者混淆基督的人性。当然,政府越去迫害那些异见者,分歧就越难以弥合。此后,只是在对神学的热情趋向神秘主义时,这些争论方才告一段落。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在600年之后没有新的教会史作品产生的原因。”“第七次基督教大公会议(787年)后,拜占庭基督教会‘合上他们的书卷’。看上去所有的异端都已经灭绝。大家最终达成一致的教义是如此完美,以至于此后没有什么可以增加或剔除的了。”^①毫无疑问,该书作者确信基督教早期历史上的教义之争只是一种理论多元化的言说,一旦这种思想释放完结,即该说的都说过了,可以用语言表达的不同意见都提出来后,神学争辩便逐渐消停,最终停顿在神秘主义的诠释之中,即语言无法表述的神学思维极限之处。而基督教神学在西欧的传播只是其思想精华的退化和对外在形式的追求,其神秘主义的思想被顽强地维护在东部帝国,这一理论特征直到今天仍然是东正教区别于天主教的核心点。^②

四是对修道生活和禁欲苦修制度形成原因的理解与后世非常不同,就像对圣徒崇拜的理解一样,后世以为是普通信徒敬仰德高望重的修道士们对上帝的献身精神,而作者却这样提出问题,“圣徒崇拜究竟是贬损原始基督教的迷信活动,还是恰恰相反,反映出有益的发展,抑或能安抚普通民众并带给他们信心?此外,君士坦丁之前的基督教是否如我们想象的那么纯洁?”修道生活也不是如传统意见认为的那样,遁世避俗,躲进古墓深山寻求清静,而是早期基督教那个“天堂里的圣徒俱乐部在上帝的恩准下可以增添新成员。现在,殉教的大门已经几乎完全关闭,所以禁欲苦修成为受人垂青的选择。在一个被认为肉体堕落的世界里,很多人愿意通过禁欲节食甚至自残(如奥利金)的手段来修行:这样做不是因为对肉体有益处,而是使精神获得自由,同时有助于获得基督许诺给其真心追随者的那些超能

① Cyril Mango, *The Oxford History of Byzantium*, pp.106, 111.

② 布尔加科夫著,徐凤林译:《东正教——教会学说概要》,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中译本“前言”。弗·洛斯基著,杨德友译,吴伯凡审译:《东正教神学导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中译本“导言”。